

## 藝術帝王李後主（二）

陳葆真

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

### 二、後主的學養

本文將試就史籍所載來論列後主的學養。依個人管見，構成後主學養的重要因素有四：一為儒學，二為佛教，三為文學，四為藝術。由於篇幅所限，作者在此先論述前面的三個議題，至於藝術部份，將另文討論。

#### 1. 後主與儒學教育

後主受中主影響，從小接受儒學教育。根據《鈞磯立談》：「後主天性喜學問。」<sup>①</sup> 又據《江南別錄》：「後主幼而好古，為文有漢魏風。母兄冀為太子，性嚴忌。後主獨以典籍自娛，未嘗干預時政。」<sup>②</sup> 又據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：「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，從嘉避禍，惟覃思經籍。」<sup>③</sup> 可知後主對儒家古典的研讀，一方面固然是因個人的興趣，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避免長兄弘冀太子的猜忌。但是，當他一有可能掌政時，便不忘由「修身、齊家」而「治國、平天下」，積極的以行動推行儒術治國。首先，當弘冀太子去世（959），他在二十三歲當年由鄭王徙封吳王，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，將被立為太子時，便開崇文館招賢士。<sup>④</sup> 在他主政以後，仍持續此一行為，比如在乾德五年（967），他三十一歲時，便「命兩省侍郎、諫議大夫、給事中、中書舍人、集賢勤政學士，分夕於光政殿宿直，與之劇談，或至夜分乃罷」。<sup>⑤</sup> 可證後主勤政的一面。同時，他更

① 見無名氏，《鈞磯立談》，四庫全書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影印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，1983），冊464，頁58。

②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頁126。

③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四部叢刊廣編，冊12，卷3，頁15。

④ 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5。又據同書，列傳卷10，頁59，潘佑傳：「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，以昭賢士，佑預其間。」

⑤ 無名氏，《鈞磯立談》，頁58～59。

鼓勵臣下讀書。<sup>⑥</sup>但是群臣的見解率多持平。因此，他在感慨之餘，便作《雜說》數萬言。根據《釣磯立談》：

其論國事，每以富民為務，好生戒殺，本其天性。承廢國之後，群臣又皆尋常充位之人，議論率不如旨。嘗一日歎曰：「周公、仲尼忽去人遠。吾道蕪塞，其誰與明？」乃著為《雜說》數千萬言，曰：「特垂此空文，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！」<sup>⑦</sup>

《雜說》的內容，根據徐鉉的序：曾包括《演樂記》、《論享國延促》、《論古今淳薄》和《論儒術》等等共有一百篇，分為三卷，而三卷之中又分上下篇。除此之外，後主又曾作《雅》、《頌》、《文賦》共三十卷，由徐鏗作序。<sup>⑧</sup>可惜這些書久已失傳。其實當時南唐朝臣也多博學之士，比較著名的如沈彬、高遠、高越、李建勳、常夢錫、鍾謨、宋齊丘、孫飭、孫晟、蕭儼、韓熙載、徐鉉、徐鏗、潘佑、張洎、李善夷、陳喬、江文蔚、江爲、湯悅（殷崇義）等人。他們在歷史、文學和藝術方面的著作在北宋中期、當歐陽修、王洙、和王堯臣等人合編《崇文總目》（1041）時還見過。<sup>⑨</sup>

後主更以實際行動獎勵儒學教育：他大力地在經費上補助白鹿洞的廬山國學。廬山國學原自烈主和中主以來便一直存在。<sup>⑩</sup>此時後主雖在連年貢宋、國家財政極端困難之下，仍然禮聘「國子助教」盧絳和朱弼等人，主持洞事；<sup>⑪</sup>並且每年劃定相當數量的田租，作為廬山國學的費用。根據李燾的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：

<sup>⑥</sup> 參見徐鉉，〈御製雜說序〉，《徐鉉集》，四庫全書，冊1085，卷18，頁141-143。

<sup>⑦</sup> 無名氏，〈釣磯立談〉，頁59。

<sup>⑧</sup> 並見徐鉉，〈御製《雜說》序〉，載《徐鉉集》，卷18，頁142-143。

<sup>⑨</sup> 關於以上這些學者在各方面的著作，詳見歐陽修、王洙、王堯臣等編，《崇文總目》（1041年刊），錢東垣等輯釋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65），頁71, 119, 189~194, 331, 345, 351, 352, 356, 357。當元代脫脫等人編纂《宋史·藝文志》時，應也根據這些資料。又，有關諸人傳記及著錄，參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卷10, 13, 14, 22, 23。

<sup>⑩</sup> 參見陳葆真，〈南唐中主的政績與文化建設〉，《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》，3期，1996年，頁74。

<sup>⑪</sup> 盧絳和朱弼傳，分別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22，頁88-89；及卷23，頁91-92。

.....白鹿洞在廬山之陽，常聚生徒數百人。李煜僭竊時，割善田數十頃，歲取其租廩給之。選太學之通經者，授以他官，俾領洞事，日為諸生講誦.....<sup>⑫</sup>

後主在推行儒學方面，最值得注意的是科舉制度。南唐科舉始於中主時期。<sup>⑬</sup>後主在這方面也力行不輟，雖內憂外患，而貢舉未曾罷行。甚至到開寶八年（975）二月，也即是宋兵攻下金陵城闕的四個月之前，後主仍命伍喬主持貢舉，取進士三十八人。<sup>⑭</sup>總計「南唐自保大十年（952）開貢舉，迄乎是歲（開寶八年，975），凡十七榜，放進士及第者九十三人」。<sup>⑮</sup>這是科舉取才制度化的具體措施。它因襲了唐代遺風，也反映出南唐君主選拔人才的開放胸襟，以及勵行文治的有效辦法。這是科舉的正面意義。雖然南唐以科舉取士，較可全面性地選拔來自各方面的人才；但是隨即也產生了負面的影響，那便是難以避免的朋黨之爭。由於負責貢舉的官員有機會趁選拔人才的過程中，與新進人員結成一黨，造成自己的勢力；各勢力之間也因此相互爭權。這種情形在中主時期已經形成。<sup>⑯</sup>最明顯的是藉由科舉出身的韓熙載、江文蔚、和徐鉉結合成一派，對抗當時的權臣，人稱「五鬼」的宋齊丘、馮延巳、馮延魯、陳覺、魏岑、和查文徽等人。最後是韓熙載和徐鉉等人佔上風。到了後主時，韓熙載已年老；但是徐鉉卻權重一時。徐鉉與張洎和陳喬結黨，對付潘佑。潘佑才高，但個性耿介，後以直諫得罪後主，自刎而死。<sup>⑰</sup>徐、潘爭權的結果是徐鉉獲勝。在此之外則為張洎對抗張佖。

<sup>⑫</sup> 見李燾，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，四庫全書，冊314，卷21，頁310，太平興國五年（980）六月己亥事。又關於南唐的學校，參閱無名氏，《南唐史》，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彙刊（台北：文海書局，無出版年），〈學校與貢舉〉條，頁181-196；高明士，〈五代的教育〉，《大陸雜誌》，1971年，43卷，6期，頁25-27。

<sup>⑬</sup> 參見陳葆真，〈南唐中主的政績與文化建設〉，頁74-77，「設學與貢舉」部份。

<sup>⑭</sup> 此數根據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9所載；夏承燾的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70載為二十八人，或誤。

<sup>⑮</sup> 劉承幹，〈南唐書補注〉（1795序），嘉業堂刻本，卷3，頁22a。至於南唐科舉考試科目的內容是詩文或經義，尚待他日查證，此處暫略。

<sup>⑯</sup> 同註<sup>⑬</sup>。

<sup>⑰</sup> 關於潘佑事，詳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9，頁78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0，頁59-60；

張洎曾誣張佖主持科考不公，後主便命張洎覆試。二人互相傾軋，直到南唐亡國。<sup>⑯</sup>

雖然南唐朝廷因科舉制度而得以選取許多人才；但是，卻由於朝臣之間結黨對立，互相傾軋，以致政爭不斷。此風已形成於中主一朝，後主也無力阻止，甚至在困擾不明中，誤殺潘佑。後來雖然時常後悔，但為時已遲。可悲的是，這些捲入朋黨對立的朝臣，未能因南唐處於危急存亡的情況而共同團結，集思保國政策，反而自相殘害。更可歎的是，縱使他們都做了亡國之臣、歸附宋朝之後，還未能因慘痛的經歷得到教訓，仍以各種方式互相排斥：張洎仍與張佖對立；而據傳徐鉉在與湯悅同奉宋太宗之命，合著《江南錄》之時，仍不免以曲筆對潘佑作不公平的記載。<sup>⑰</sup>

總之，後主雖然本身好學，也鼓勵群臣讀書，致力推行教育，更以才學取士，但是這些努力仍不足以教化人心、共臻和諧。學問與修養原非一事，何況能知者未必能行。黨同伐異，人性之偏，雖碩學如徐鉉等人者也屬難免。教育在本質上奠基於一種樂觀的理想，期望每個人可以經由知識而自覺地從根本上去轉化人性的偏失，成為寬容忍讓的自我；但是，是非、善惡、愛憎、寬忌等等行為上的抉擇仍舊因為人性而各異。以上事例，僅為一斑。有別於群臣的是，後主的天性仁厚，又能積學修善。他除了是個謙沖的儒者之外，更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。以下我們來看後主與南唐的佛教信仰。

周在濬，《南唐書注》（18世紀初年），嘉業堂刻本，卷3，頁14a；劉承幹，《南唐書補注》，卷3，頁12b，15b。

<sup>⑯</sup> 張洎與張佖二人隨從後主赴汴，入仕北宋。張佖忠信，時常暗訪後主、照料南唐遺臣；後主去世後，每逢忌日還上墳祭拜，並且照顧後主遺眷，其事見周在濬，《南唐書注》，卷3，頁13a-28b。張洎尖刻，有才無德，入宋以後，雖因逢迎而居高位，但為宋初朝臣所不齒，其事見周在濬，《南唐書注》，卷3，頁1b~5b。

<sup>⑰</sup> 此據南唐遺臣鄭文寶所言：「太宗皇帝欲知前事，命湯悅、徐鉉撰成《江南錄》十卷。事多遺落，無年可編，筆削之際，不無高下，當時好事者往往少之。」見《江表志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卷1，頁132。這是為何鄭文寶作《江表志》的原因。查鄭文寶曾於太平興國二年（978）作《南唐近事》二卷，而現存無名氏，《江南餘載》二卷雖不能斷為鄭所作，但可補其《江表志》之缺。此據該書前紀昀等的提要考證。見四庫全書，冊464，頁149-150。

## 2. 後主與佛教信仰

南唐三主都篤信佛教。他們在全國廣建寺廟，獎勵僧尼剃度；本身十分禮敬法師；朝臣也多素食；崇佛之風盛行，佛教儼然成為國教。這是當時除了吳越之外其他各國所少見的現象。因此後來馬令和陸游在各自所修的《南唐書》中，才特別就這種史實而別立《浮屠傳》。<sup>⑱</sup> 雖然當時吳越也篤信佛教，但崇佛之盛不及南唐。是以馬令有言：「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，而吳越亦然。南唐每建蘭若，必均其土田，謂之常住產。錢氏則廣造堂宇，修飾塑像而已……」。<sup>⑲</sup> 又宋代各種史書及筆記小說中，有關南唐信佛的記載極多，至少有六種以上，在此不再重覆。<sup>⑳</sup> 南唐三主信佛的傳統與烈祖原來家庭的信仰有關。<sup>㉑</sup> 後主自小耳濡目染，加上天性仁厚，以及後來遭遇困阨，因此信佛的程度更過於他的父親和祖父。後主信佛篤誠，中年（三十二歲，968）以後更甚，史書多有記載。根據陸游《南唐書》：

〔後主在〕宮中造佛寺十餘。出餘錢募民及道士為僧。都城至萬僧，悉取給縣官……後主退朝與后著僧伽帽，服袈裟，頌經胡跪稽額，至為瘤贅，手常屈指作佛印……<sup>㉒</sup>

馬令也有類似的記載：

〔後主〕輒於禁中崇建寺宇，延集僧尼，……由是建康城中僧徒進至數千，給廩米緡帛以供之……<sup>㉓</sup>

陳彭年則更明確的指出：

<sup>⑱</sup> 參閱馬令及陸游的《南唐書》，卷26及卷18。又參見周在濬，《南唐書注》，卷18；劉承幹，《南唐書補注》，卷18。

<sup>⑲</sup>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26，頁102。

<sup>㉑</sup> 詳見夏承焘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55-59。

<sup>㉒</sup> 關於烈祖和中主信佛的情形，參見陳葆真，《南唐中主的政績與文化建設》，頁63-66，「崇佛好道」部份。

<sup>㉓</sup>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5，頁82。

<sup>㉔</sup>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26，頁101。

後主篤信佛法，於宮中建永慕宮；又於苑中建靜德僧寺；鍾山建精舍，御筆題為「報慈道場」。<sup>26</sup>

這三處道場加上烈祖在昇元年間新建的淨妙寺，中主四弟景達在保大年間建立的奉先寺，此外還有證聖寺，以及原來就有的清涼寺（原稱興教寺）和昇元寺（原為瓦官寺），以及遠在廬山的開先寺、圓通寺、棲賢寺、歸宗寺、和延福院，總計南唐時期由皇室興建或贊助的寺宇至少有以上的十三處。<sup>27</sup>可惜它們歷經各朝代的兵災之後，多已殘破。其中清涼寺尤為重要。它是南唐皇室最重要的宗教活動場所。寺中曾建有「李氏避暑宮」和「德慶堂」；堂匾為後主所書。又有名畫家董羽畫龍、及李霄遠草書，合稱三絕。還有後主追荐烈主而造的鐘。<sup>28</sup>

此外，朝臣也因皇室信佛而蔚為風氣：素食、為名刹題記刻碑、出資建塔等等活動，不勝枚舉。<sup>29</sup>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名將林仁肇和史家高越兩人。<sup>30</sup>他們曾出資重建位在金陵郊外東北方的棲霞寺舍利塔。棲霞寺原建於南朝齊、梁（479-557）之際。舍利塔在隋文帝仁壽元年（601）後毀。林仁肇和高越重建的舍利塔現今仍在，是了解南唐建築和雕刻藝術十分重要的作品（圖一）。<sup>31</sup>此外，朝臣如徐鉉、李建勳、和周繇等人也曾分別為棲

<sup>26</sup> 陳彭年為南唐才子，曾於後主時入宮陪侍皇子仲宣，後入宋為官，其說南唐宮苑事，詳而可信。此據其《江南別錄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頁161。

<sup>27</sup> 此為個人集錄陳舜俞，《廬山記》，大正大藏經（台北：新文豐，1983重印），冊51，頁1025~1050；葛寅亮，《金陵梵刹志》（1627），冊2，卷19，頁848-851；及吳宗慈，《廬山志》（1936），冊1，卷2，頁301所得。後二書並收於杜潔祥主編，《中國佛寺史志彙刊》（台北：明文書局重印本，1980），第1、2輯；又、有關中主捨廬山讀書臺為開先寺事參見陳葆真，〈南唐中主的政績與文化建設〉，頁63-65。

<sup>28</sup> 同上註，陳文，頁63。

<sup>29</sup> 詳情參見上註，頁63-65。

<sup>30</sup> 林仁肇及高越傳，見馬令《南唐書》，卷12，頁54-55；卷13，頁55。又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1，頁64；卷6，頁41。

<sup>31</sup> 參見史岩，〈五代兩宋雕塑概說〉，《中國美術全集》，雕塑篇（北京：人民美術社，1988），冊5，頁3-5。又參見孫大章、喻維國，〈宗教建築藝術〉，同書，宗教建築篇，冊4，圖版36，37及頁12，13，說明部份。

霞寺作詩或題記，可知它在當時是十分著名的佛教勝地。<sup>32</sup>

由於信佛，因此後主極為禮敬僧侶，特別是對當時青原行思法嗣的禪宗高僧，如金陵報恩寺的法眼文益（淨慧，885-958），和清涼寺的法燈文遂（泰欽，-974），兩位禪師尤為尊崇。<sup>33</sup>後主仍為鄭王時，便受法於淨慧（文益）禪師。<sup>34</sup>文益禪師長於詩文，傳說他曾作〈牡丹詩〉諷諭中主。<sup>35</sup>而當文遂禪師圓寂時（974），後主還為他立碑頌德，韓熙載則為他撰寫塔銘。<sup>36</sup>據史料得知，曾受後主供養、或同時活動於南唐的知名法師，包括：宮中淨德道場的智筠（906-969）和沖煦（916-974），金陵報恩院的清護（916-970），鍾山的道欽，潤州的光逸，廬山圓通寺的緣德（898-977），歸宗寺的道詮禪師，蘄州四祖山的清皎（906-993）；<sup>37</sup>此外，稍早還有木平和尚和玄覺導

<sup>32</sup> 徐鉉雖不篤信佛，但也曾在保大辛亥（951）年作〈攝山棲霞寺新路記〉；李建勳作〈遊接霞寺〉詩；周繇作〈棲霞寺贈月公〉等。見葛寅亮，《金陵梵刹志》，冊2，卷4，頁507-508；618-619。

<sup>33</sup> 兩位禪師與南唐中主和後主的關係都相當密切。二人傳記分別載於道原，《景德傳燈錄》（1004序），四部叢刊廣編，冊32，卷28，頁293-294。又參閱陳葆真，〈南唐中主的政績與文化建設〉，頁63-65。

<sup>34</sup> 見葛寅亮，《金陵梵刹志》，冊2，卷4，頁870。按淨慧本姓魯，浙江餘杭人，七歲出家於新定智通院，遊歷福建、江蘇、江西、湖南，後住持金陵報恩寺，深得中主與後主禮敬。見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1），卷74，頁55。

<sup>35</sup> 詩曰：「擁毳對芳叢，由來趣不同；瑟從今日白，花是去年紅。艷冶隨朝露，馨香逐晚風；何須待零落，然後始知空。」但宋人卻誤以為此詩是諷諭後主的。原見釋惠洪，《冷齋夜話》，四庫全書，冊863，卷1，頁244，「李後主亡國偈」；又見夏承焘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68。兩人都以此詩為文益禪師諷諭後主宋兵將來伐之事。實際上，文益卒於後周顯德五年（958），時中主在位，後主未立，故不合史實。參見陳葆真，〈南唐中主的政績與文化建設〉，頁64。又，此詩並不見錄於北宋道原所撰《景德傳燈錄》（1004序）文益法偈詩文中。除幾字相異外，同詩最早出現於陶岳所撰《五代史補》（1012），四庫全書，冊407，卷5，頁683中，謂此詩為僧謙光奉中主之命而作。很可能到北宋末年徽宗時，釋惠洪始將此詩誤傳為文益禪師之作。

<sup>36</sup> 見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卷23，頁598。

<sup>37</sup> 以上有關智筠、清護、沖煦、緣德、清皎部份，見陳垣，《釋氏疑年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4初版，1988，三版），卷6，頁188，190，192；有關道欽及光逸小傳，見贊寧，《宋高僧傳》，卷23，頁598。又參見道原，《景德傳燈錄》，卷21，沖煦及清護傳；卷23，清皎傳；卷24，道詮傳。

師及清涼寺的明禪師，和奉先寺的深禪師等人。<sup>⑯</sup> 又據說當宋軍圍城正急時，後主因被矇蔽不知，以致於還居淨室，聽德明、雲真、義倫、崇節等法師開示講解《楞嚴經》和《圓覺經》。<sup>⑰</sup> 對於後主信佛一事，宋人更有許多傳聞記載，或為口耳相傳、言過其實，或屬勝利者藉以誣篾後主為昏君的杜撰之言。<sup>⑱</sup>

但是，無論如何，宋人在當時已經利用後主信佛篤誠的這一點，而派僧侶作間諜，潛伏到南唐，在軍事重地如牛首山和采石磯等地，建塔寺、造佛像，作為掩護，以待日後宋兵南下時，裡應外合。在反間僧侶中，最有名的是號為「小長老」的江正。小長老在開寶二年（969）左右南來，因長於論辯而深得後主信任。他慫恿後主奢極慾，以為不如此，則無法體會佛國華嚴之美。本來尊禮禪宗，偏好佛理的後主，或因逃避現實的困頓，因此轉而寄望小長老的法力，期望他護持國祚。直到開寶八年（975）宋兵圍城時，後主還手書發願祝禱文，期望佛力保佑，渡過危機。最後金陵終於淪陷，這時後主才知小長老之詐。傳說後主曾下令斬殺小長老。但實際上，在兵慌馬亂中，小長老已趁機脫逃，並趁南唐亡國之際奪取皇室的許多圖籍。<sup>⑲</sup> 雖則如此，但後主對佛教仍然一本初衷，極為篤誠。就在亡國後淪為俘虜、被押解前往汴京的途中，經過臨淮，他還「往禮普光王塔，施金帛猶以千計」。<sup>⑳</sup> 可說他對佛教的信仰始終未曾動搖。

總之，後主因特殊的人生遭遇，而深刻地體會了佛家的「萬法本空」，「世事無常」的道理。佛門的「空」理，也自然流露在他的詩文作品中，例如他

<sup>⑯</sup> 見葛寅亮，《金陵梵刹志》，冊5，卷48，頁1438-1439；1442-1443。又參見道原，《景德傳燈錄》，卷20，木平和尚；卷23，明禪師，深禪師等傳。

<sup>⑰</sup>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9。

<sup>⑱</sup> 關於這點，夏承焘已辯其不可盡信，見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59。

<sup>⑲</sup> 小長老傳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22，頁101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5，頁82。傳言小長老南來（969），暫投法眼禪師座下。但事實上，那時法眼已卒（958），因此不可能。又，小長老入宋後為安陸刺史。他本身富於藏書，在得南唐及後來吳越亡國後的收藏，總數共達萬卷，後散佚；到北宋神宗朝的翰林學士鄭毅夫作《江氏書目》時，還登錄其收藏文集數百卷。參見王明清，《揮麈後錄》，四庫全書，1038冊，卷5，頁468-9，〈樊若水〉條。

<sup>⑳</sup>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5，頁82-83。

在二十八歲（964）時，為悼念四歲早殤的次子仲宣的詩中有言：「空王應念我，窮子正迷家」。次年（965），他在哀昭惠后的輓辭中又說：「穢麗今何在？飄零事已空」。而他在兩首大約作於這時的病中詩中，又說：「賴問空門知氣味，不然煩惱萬塗侵」；以及「前緣竟何似？誰與問空王」。<sup>㉑</sup> 此處「空王」即指佛而言。又、在他晚期所作的詞中，更見許多「夢」與「空」的辭句。著名的例子比如：「世事漫隨流水，算來一夢浮生」〈錦堂春〉；「夢裡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貪歡」〈浪濤沙〉；「往事已成空，還如一夢中」〈子夜歌〉等等。<sup>㉒</sup> 這些用語處處顯示他受佛家思想的影響，特別是《金剛經》所揭示的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；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

後主熟習經典，曾手抄《心經》送給宮女喬氏。在他過世後，當時已被宋太宗納入禁中的喬氏，便將自己收藏的《心經》捐贈到汴京的相國寺西塔院，以荐後主冥福，並以極工整的書法在卷後加上了一段情深動人的跋文：

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，伏遇國主百日，謹捨昔時賜妾所書《般若心經》一卷，在相國寺西塔院，伏願彌勒尊前，持一花而見佛……<sup>㉓</sup>

可知後主平日對喬氏的情真意摯，才會令喬氏在他逝世之後還如此地緇念情深。同樣的，由於南唐在皇室三代長期提倡佛教之下，僧侶得到相當的照顧，因此，這些僧侶在必要時，也能同仇敵愾，捍衛國家，比如廬山圓通寺，「……南唐時曾賜田千頃，其徒數百眾，養之極其豐厚。王師渡江，寺僧相率為前鋒以抗。未幾，金陵城陷，乃遁去」。<sup>㉔</sup> 可悲的是，南唐亡國之後，百分之六、七十的僧尼都被迫還俗，有的還甚至被黥面充當兵員。宋人如此強硬的作法，令人望而生畏。<sup>㉕</sup>

<sup>㉑</sup> 以上句子都見於清聖祖敕編，《欽定全唐詩》，四庫全書，冊1423，頁159-160。

<sup>㉒</sup> 又、關於後主詞中喜用「夢」、「月」，等字的討論，參見郭德浩，〈李後主評傳〉，收於龍沐勸等，《李後主和他的詞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71），冊上，頁66-67。

<sup>㉓</sup> 北宋末年王銘還曾見過這件作品，見其《默記》，四庫全書，冊1038，卷中，頁342。

<sup>㉔</sup> 原文見曾敏求，《獨醒雜志》，四庫全書，冊1039，卷1，頁529；又見夏承焘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57；夏氏轉引，與原文稍有出入。

<sup>㉕</sup> 見賈似道，《悅生隨抄》，收於陶宗儀，《說郛》，四庫全書，冊877，卷20下，頁1970；又見夏承焘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55。

總之，南唐由於三主都篤信佛教，因此朝野信佛蔚為風氣，除了後主的四叔景過和朝臣徐鉉外，無一不深受佛教影響。<sup>⑧</sup> 後主子侄輩中，甚至有人在入宋後出家為僧，比如活動於北宋真宗景德到祥符（1004-1016）年間的譯經光梵大師惟淨，便是吉王從謙的兒子。<sup>⑨</sup> 縱然如此，南唐終究不能免於無常之劫而煙消雲散，正如後主在他詞中所感歎的：「往事已成空，還如一夢中」。以下讓我們回頭來看後主的文學成就。

### 3. 後主的文學成就

後主之所以能在中國歷史上留芳百世的主要原因，不在於他是個亡國之君，令人同情，而在於他是位情真意摯，才氣縱橫的文學家和藝術家。他的作品令人讚歎，動人心絃。誠如徐鉉在後主的墓誌銘中所說的，後主「弧矢之善，筆札之工，天縱多能，必造精絕」。<sup>⑩</sup> 他能文能武，尤擅於文學和藝術創作。後主自幼好讀古文，擅長文辭，精於各種文體。以下作者將試就傳世的著錄和作品來探討後主的文學創作：首先將它們分為文（包括賦）、詩、詞等三大類，並進而論述這些作品形成的背景。

#### A. 後主的文與賦

後主的文、賦類作品，又可以依內容的性質再分為文集、雜論、官方文書、祝禱文、與抒情文等五種。關於第一種「文集」方面，根據徐鉉的後主《墓誌銘》，其中說後主「鴻筆藻麗，玉振金相，曾作有：雅、頌、文賦凡三十卷」。<sup>⑪</sup> 這三十卷文集的前面，並有徐鉉的一篇序。<sup>⑫</sup> 可惜這三十卷

<sup>⑧</sup> 景過不似他人信佛之篤誠，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6；徐鉉雖不篤信佛教，但也參與佛教相關的活動，如前所述。

<sup>⑨</sup>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5，頁83。

<sup>⑩</sup> 見徐鉉，《騎省集》，卷29，頁222。

<sup>⑪</sup> 同上註。

<sup>⑫</sup> 見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9；徐鉉，《騎省集》，卷18，頁142。徐鉉為徐鉉之弟，精於文字音韻，其傳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4，頁62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2，頁23-24。

的文集到北宋仁宗慶曆元年（1041），當歐陽修、王洙、和王堯臣等人編修《崇文總目》時，已只剩《李煜集》十卷及《李煜集略》十卷了。<sup>⑬</sup> 更可惜的是《李煜集》十卷後來也已失佚，因此，對於原來文集的內容更無從知曉。

第二種是他的雜論，最重要的是他的《雜說》數萬言，現今也已失傳。現在只能靠當初徐鉉所作的〈御製雜說序〉來了解此書的篇目。它們包括〈演樂記〉，〈論享國延促〉，〈論古今淳薄〉，和〈論儒術〉等，總共有一百篇左右，共分為三卷。<sup>⑭</sup> 至於後主作此書的原因與目的，則是為落實儒家的理想來治國。這在前面已經討論過了，在此不再贅述。<sup>⑮</sup> 又、由篇目中可以看出後主的《雜說》是他所寫的各種議論文集，當時人以為它的價值可以比美曹丕（187-226）的《典論》。<sup>⑯</sup>

第三種為官方文書。後主現存最有名的官方文書有三件，分別為〈即位上宋太祖表〉（961），〈乞緩師表〉（975），及〈不敢再乞潘慎修掌記室手表〉（976 或 977）。這三件官方文書中，夏承燾認為前兩件或為朝官代筆。<sup>⑰</sup> 比如第一件，〈即位上宋太祖表〉，那是後主剛即位，派馮延魯入貢時呈給宋太祖的。文中以十分謙讓的語氣向宋太祖稟告他的天性閒散，對政治和權勢並無興趣；並說明他的即位純屬偶然，只因「徒以伯仲繼沒，次第推遷」的結果。因此，對於宋朝，他一定效忠：「既嗣宗祊，敢忘負荷？惟堅臣節，上奉天朝」。同時，他希望在宋太祖的照應下，容許南唐安全存在。<sup>⑱</sup> 全文

<sup>⑬</sup> 參見歐陽修等，《崇文總目》，前引書，頁315, 357。

<sup>⑭</sup> 徐鉉，《騎省集》，卷18，頁142。

<sup>⑮</sup> 參見前述《鈞磯立談》，頁59。

<sup>⑯</sup>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6。

<sup>⑰</sup> 見夏承燾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92。

<sup>⑱</sup> 其文曰：「臣本諸子，實愧非才。自出膠庠，心疏利祿。被父兄之蔭育，樂日月以優遊。思追巢、許之餘塵，遠慕夷、齊之高義……況陛下懷柔義廣，煦嫗仁深，必假清光，更逾曩日。遠憑帝力，下撫蒼邦，克獲宴安，得從康泰……」全文見清仁宗敕編，《欽定全唐文》（1814；台北：鼎文書局重印），冊3，卷128，頁14-15。

語氣忠誠，可惜並未得到宋太祖的眷顧。又如第二件，〈乞緩師表〉，那是當宋軍已圍金陵，南唐危急存亡之際，後主派徐鉉和周惟簡去求宋太祖退兵的文件。全文口氣卑微，哀求宋太祖手下留情，保全南唐社稷，以免他成為亡國之君。<sup>⑤9</sup>但這懇求並未得遂。他終於成為汴京的囚虜。至於第三件、〈不敢再乞潘慎修掌記室手表〉、則是後主因居汴京時上奏宋太宗的文書。它應是後主所作的。文書的內容提到他自己初到汴京時，只敢求太祖派沒有經驗的南唐舊臣徐元榘，作為他的記室，掌理文書、牋奏等事；但徐元榘少不更事，因此，他只好凡事親自動手。後來太宗又加派另一南唐舊臣潘慎修為後主記室。<sup>⑥0</sup> 潘為後主所信任的舊臣，曾在開寶七年（974），奉命入貢宋朝，<sup>⑥1</sup> 此時奉太宗之命，得再事後主。後主為避嫌，而上此表，說明事情始末。行文語氣謙讓，處處小心，惟恐引起太宗的猜忌：

昨因先皇（宋太祖）臨御，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？臣即乞徐元榘。元榘方在幼年，於牋表素不諳習……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榘，其潘慎修更不敢陳乞。所有表章，臣且勉勵躬親。臣亡國殘骸，死亡無日，豈敢別生僥覲，干擾天聽？只慮章奏之間，有失恭謹，伏望睿慈，察臣素心。<sup>⑥2</sup>

這一則表文為後主自撰自書，北宋時流入潘興嗣家，王鉉曾經見過，並且抄錄了一本，<sup>⑥3</sup> 可惜後來與原跡並皆失傳。

<sup>⑤9</sup> 「……惟陛下寬之、赦之……倘令臣進退之跡，不至醜惡，宗社之失，不自臣身，是臣生死之願畢矣，實存沒之幸也……實舉國之受賜也……實天下之鼓舞也……」。全文見《欽定全唐文》，卷128，頁15。

<sup>⑥0</sup> 參見夏承焘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82。

<sup>⑥1</sup> 見夏承焘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68。

<sup>⑥2</sup> 見《欽定全唐文》，卷128，頁15-16；又原文見王鉉，《四六話》，四庫全書，冊1478，卷下，頁957。

<sup>⑥3</sup> 同上註王鉉部份。

第四種為後主手書的祝禱文：包括他在南唐有一次乾旱時，向天求雨的〈祈雨文〉；平日他讀佛經時的〈看經發願文〉；以及金陵圍城正急時他向佛祖求佑發願的〈祝禱文〉。後主的〈祈雨文〉在北宋初年即已殘缺不全，只剩下一句殘句：「尚垂龍潤之祥」，載在陶穀的《清異錄》中。<sup>⑥4</sup> 他在〈看經發願文〉的末尾，款題為「蓮峰居士」。<sup>⑥5</sup> 由於資料殘缺，因此這兩件作品的詳細內容都不清楚。至於他的〈祝禱文〉內容，根據《墨莊漫錄》上的記載，較為具體：

宣和間，蔡賓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，來京師以獻蔡條約之，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，倉促中作一疏，禱於釋氏：願退兵後，許造佛像若干身，菩薩若干身，齋僧若干萬員，建殿宇若干所。其數皆甚多，字畫潦草，然皆道勁可愛。蓋危窘急中所書也。<sup>⑥6</sup>

可惜這件作品真蹟現已失傳。

第五種為後主的抒情文：包括有名的〈昭惠周后誄辭〉（964），〈送鄧王二十六弟牧宣城序〉（968），和〈卻登高文〉（974）。這三篇文章都收錄於《全唐文》中。<sup>⑥7</sup> 〈昭惠周后誄辭〉是後主為悼念大周后而作的。全篇以四言韻文記述了大周后的資質優美、姿色艷麗、才華秀逸、情深意摯，以及他對周后之死的哀痛逾恒，對她思念的歷久彌長。全文反覆著這類情思，文辭纏綿悱惻，沈痛感人，諸如：

……含顰發笑，擢秀騰芳。鬢雲留鑒，眼彩飛光。情瀾春媚，愛語風香。瓊姿稟異，金冶昭祥。婉容無犯，均教多方。茫茫獨逝，捨我何鄉……執子之手，

<sup>⑥4</sup> 見陶穀，《清異錄》，四庫全書，冊1047，卷上，頁840。

<sup>⑥5</sup> 見夏承焘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4。原見張邦基，《墨莊漫錄》，四庫全書，冊864，卷7，頁65。

<sup>⑥6</sup> 見張邦基，同上註。又夏承焘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74轉引，與原文之字句小有出入。

<sup>⑥7</sup> 見《欽定全唐文》，卷128，頁16-20。

與子偕老。今也如何，不終往告……遺情睞眄，哀淚漣漣……如何一旦，同心曠世……<sup>⑯</sup>

另外，他的〈送鄧王二十六弟牧宣城序〉一文，作於開寶元年(968)，時間明確。<sup>⑰</sup>至於他的〈卻登高文〉則是他為七弟從善而作的。從善在開寶四年(971)入貢北宋，被押羈在汴京當人質而不得歸。後主天性友愛，為此幾次與宋交涉沒有結果，從此「歲時宴會皆罷，惟作〈卻登高賦〉以見意」。<sup>⑱</sup>全篇以四六韻文，描述他從前和從善一起游心於金石書畫，並吟詩作詞的樂趣，以及分離後的思念之苦：

昔時之壯也，情槃樂恣，觀賞忘勞。情心志於金石，泥花月於詩騷……愴家艱之如燬，縈離緒之鬱陶。陟彼岡矣〔兮〕企予足。望復闕兮睇予目。原有鵠兮相從飛。嗟予季兮不采歸。空蒼蒼兮風淒淒。心躊躇兮淚漣漣。無一歡之可作，有萬緒以纏悲……<sup>⑲</sup>

後主的韻文作品，除以上的文與賦之外，最重要的當是他的詩與詞了。以下我們先看他的詩。

## B. 後主的詩

後主詩作原本必然相當多，但至今留存下來的，可能百不及一。依《欽定全唐詩》所收，內容完整的只有十八首，分別是：(1)〈九月十日偶書〉，(2)〈秋鶯〉，(3)〈病起題山舍壁〉，(4)〈送鄧王二十〔六〕弟從益〔鑑〕牧宣城〉，(5)〈渡中江望石城泣下〉，(6)(7)〈輓辭〉二首，(8)〈悼詩〉，(9)(10)〈感懷〉二首，(11)(12)〈梅花〉二首，(13)〈書靈筵手巾〉，(14)〈書琵琶背〉，(15)〈病中感懷〉，(16)〈病中書事〉，(17)〈賜宮人慶奴〉，

<sup>⑯</sup> 見《欽定全唐文》，卷128，頁17-20；又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6，頁29。

<sup>⑰</sup> 文見《欽定全唐文》，卷128，頁16-17；又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7，頁35-36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7-78。

<sup>⑱</sup>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7。此事又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7，從善傳。

<sup>⑲</sup> 文見《欽定全唐文》，卷128，頁17；又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7。

(18)〈題金樓子後〉。另外有殘句十六段。<sup>⑳</sup>其中第五首為〈渡中江望石城泣下〉：

江南江北舊家鄉，三十年來夢一場；  
吳苑宮闈今冷落，廣陵臺殿已荒涼。  
雲籠遠岫愁千片，雨打孤舟淚萬行；  
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閒坐細思量。<sup>㉑</sup>

這首詩雖然北宋的龍袞和馬令都以為是後主所作，<sup>㉒</sup>但是曾經親事過後主、後來再入仕北宋的南唐舊臣鄭文寶，卻早已指出這首詩的作者應是吳讓皇(楊溥)，居太州永寧宮時所作。<sup>㉓</sup>北宋另有學者以為此詩是楊溥因李昇(徐知誥，南唐烈祖)逼位而離開金陵(937)，在渡過長江時，望石頭城泣下而作的。<sup>㉔</sup>因此上列後主的詩，存全者應只有十七首。

但是，《全唐詩》只是登錄了這些詩篇的文字，並未根據它們的內容予以分類或編年，缺乏系統性的說明。以下，作者將對它們稍加整理：首先從內容上來探討它們成詩的時間和背景因素；其次就文字上簡論後主詩作的風格特色。依個人管見，就內容而言，《全唐詩》所收的這十七首詩(1-18，第5首除外)可以分為以下的五類：

1. 傷亡：包括(6)(7)〈輓辭〉二首，和(8)〈悼詩〉等共三首。
2. 懷舊：包括(9)(10)〈感懷〉二首，(11)(12)〈梅花〉二首，和(13)〈書靈筵手巾〉等共五首。
3. 感傷：包括(1)〈九月十日偶書〉，(2)〈秋鶯〉，(3)〈病起題山舍壁〉，(15)〈病中感懷〉，和(16)〈病中書事〉等共五首。

<sup>㉑</sup> 以上諸詩皆見清聖祖敕編，《欽定全唐詩》(1706)，四庫全書，冊1423，卷8，頁158-160。

<sup>㉒</sup> 同上註，頁159。

<sup>㉓</sup> 見龍袞，《江南野史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卷3，頁84；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6。

<sup>㉔</sup> 見鄭文寶，《江表志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卷1，頁134。

<sup>㉕</sup> 見宋人，《五國故事》，知不足齋叢書(台北：藝文印書館重印)，卷10，頁66。又，夏承焘據《五國故事》，《九國志》，《十國春秋》等書，加以詳細考證，也認為此詩應是吳讓皇所作，見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79。

4. 送別：如〈送鄧王二十〔六〕弟從益〔鎰〕牧宣城〉一首。
5. 詠物：包括(14)〈書琵琶背〉，(17)〈賜宮人慶奴〉，和(18)〈題金樓子後〉等共三首。

從成詩的時間來看，則這十七首詩中有十四首應當可以確認是作成於大周后過世後，到南唐滅亡前的十二年（964-975）之間。其中比較確定的是傷亡類的〈輓辭〉二首和〈悼詩〉一首：

#### 〈輓辭〉二首

珠碎眼前珍，花凋世外春；  
未銷心裡恨，又失掌中身。  
玉筍猶殘藥，香奩已染塵；  
前哀將後感，無淚可沾巾。  
  
艷質同芳樹，浮危道略同；  
正悲春落實，又苦雨傷叢。  
穠麗今何在，飄零事已空；  
沈沈無問處，千載謝東風。

#### 〈悼詩〉

永念難消釋，孤懷痛自嗟；  
雨深秋寂寞，愁引病增加。  
咽絕風前思，昏蒙眼上花；  
空王應念我，窮子正迷家。<sup>(77)</sup>

由於它們是後主為了哀輓大周后和次子仲宣而作，因此，成詩的時間應可推斷在二人卒後（964）不久。接著，後主因哀傷過度而大病一場。感傷類之中的〈病中感懷〉、〈病中書事〉、及〈病起題山舍壁〉等三首或許作於此時，詩中正適切地描寫了他那時的心境：

<sup>(77)</sup> 以上三首詩，均見《欽定全唐詩》卷8，頁159。

#### 〈病中感懷〉

顛頓年來甚，蕭條益自傷；  
風威侵病骨，雨氣咽愁腹。  
夜鼎唯煎藥，朝髭半染霜；  
前緣竟何似？誰與問空王？

#### 〈病中書事〉

病中堅固道情深，宴坐清香思自任；  
月照靜居唯搆藥，門扃幽院只來禽。  
庸醫嬾聽詞何取，小婢將行力未禁；  
賴問空門知氣味，不然煩惱萬塗侵。

#### 〈病起題山舍壁〉

山舍初成病乍輕，杖藜巾褐稱閒情；  
爐開小火深回暖，溝引新流幾曲聲。  
暫約彭涓安朽質，終期宗遠問無生；  
誰能役役塵中累？貪合魚龍構強名。<sup>(78)</sup>

因此，這三首詩很可能是作於大周后與仲宣逝世的當年或次年（964 或 965）。當時後主陷於沈痛之中，無力自拔，因此在詩中一再藉佛理的「緣」和「空」的觀念，來提醒自己接受人生無常的事實。

雖然後主在大周后病重時，早已與小周后訂情，四年後（968）且正式聘納小周后，<sup>(79)</sup>但是，他對大周后的懷念日久彌深。因此，懷舊類的〈感懷〉、〈梅花〉、和〈書靈筵手巾〉等五首，很明顯的可以看作是他因思念大周后而作的：

#### 〈感懷〉

又見桐花發舊枝，一樓煙雨暮淒淒；

<sup>(78)</sup> 以上三首詩，皆見上註，頁158-160。

<sup>(79)</sup> 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3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6。

凭闌惆悵人誰會？不覺潸然淚眼低。  
層城無復見嬌姿，佳節纏哀不自持；  
空有當年舊煙月，芙蓉城上哭蛾眉。

## 〈梅花〉

殷勤移植地，曲檻小闌邊；  
共約重芳日，還憂不盛妍。  
阻風閒步障，乘月溉寒泉；  
誰料花前後，蛾眉卻不全。

又

失卻煙花主，東君自不知；  
清香更何用，猶發去年枝。

## 〈書靈筵手巾〉

浮生共顛頓，壯歲失嬋娟；  
汗手遺香漬，痕眉染黛煙。⑩

這五首詩作成的時間，很可能是在大周后過世到後主再娶小周后之間（964-68）。

感傷類中還有其他兩首：

## 〈九月十日偶書〉

晚雨秋陰酒乍醒，感時心緒杳難平；  
黃花冷落不成艷，紅葉颼颼競鼓聲。  
背世近能厭俗態，偶緣猶未忘多情；  
自從雙鬢斑斑白，不學安仁卻自驚。

## 〈秋鶯〉

殘鶯何事不知秋，橫過幽林尚獨遊；

⑩ 以上五首詩均見《欽定全唐詩》卷8，頁159。

老舌百般傾耳聽，深黃一點入煙流。  
棲遲背世同悲魯，瀏亮如笙啐在緘；  
莫更留連好歸去，露華淒冷夢花愁。⑪

這兩首詩中一再提到「背世」、「偶緣」、「鬢白」、「淒冷」、「愁」等句，顯見他心情的悲涼。雖然後主在三十二歲（968）那年再納小周后，生活上也趨於奢華、耽於逸樂，但是，國事日非，使他心情抑鬱，直到亡國。這兩首詩或是他此期（968-975）的作品。

送別類的〈送鄧王二十〔六〕弟從益〔鑑〕牧宣城〉作於開寶元年（968），時間明確，已如上述。⑫

詠物類的〈書琵琶背〉是後主為大周后的燒槽琵琶所寫的詩：

侁自肩如削，難勝數縷條；  
天香留鳳尾，餘煥在檀槽。⑬

大周后的琵琶得自中主的賞賜。⑭ 後主作這首詩的時間很可能是在與大周后成婚（954）後不久。

至於其他二首：〈賜宮人慶奴〉，及〈題金樓子後〉，其成詩的時間和背景都難以考訂，因此不敢在此妄論。

《全唐詩》所收後主詩篇殘句十六段（1-16），⑮ 依內容而言，這些殘句可以分為五類：

## 1. 擬古類，包括

殘句（1）：「迢迢牽牛星，杳在河之陽；  
粲粲黃姑女，耿耿遙相望。」

⑪ 以上二首詩，均見上註，頁158。

⑫ 同註⑩。

⑬ 同註⑩。

⑭ 中主解音律，珍藏蔡邕的焦尾琴（即燒槽琵琶），以大周后擅長彈琵琶，因而特以名琴賞賜她。參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6，頁28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3。

⑮ 皆見《欽定全唐詩》，卷8，頁160。

殘句(9)：「人生不滿百，剛作千年畫。」

#### 2. 詠物類，包括

殘句(2)：「驚狂應有恨，蝶舞已無多。」

(詠落花)

殘句(3)：「揖讓月在手，動搖風滿懷。」

(詠扇)

#### 3. 感懷類，包括

殘句(4)：「病態如衰弱，厭厭向五年。」

殘句(5)：「衰顏一病難牽復，

曉殿君臨頗自羞。」

殘句(6)：「冷笑秦皇經遠略，

靜憐姬滿苦時巡。」

殘句(7)：「鬢從今日添新白，

菊是去年依舊黃。」

殘句(8)：「萬古到頭歸一死，

醉鄉葬地有高原。」

#### 4. 寫景類，包括

殘句(10)：「日暎仙雲薄，秋高天碧深。」

殘句(11)：「烏照始潛輝，龍燭便爭秉。」

殘句(12)：「凝珠(?)滿露珠。」

殘句(13)：「游飈日已西，肅穆寒初至。」

#### 5. 宴會類，包括

殘句(14)：「九重開扇鵠，四牖炳燈魚。」

殘句(15)：「羽觴無算酌。」

殘句(16)：「傾盃更爲壽，深卮遞酬賓。」

由以上這些殘句本身很難精確地斷定它們成詩的時間。不過，其中有幾句展現比較明顯的證據，可與他的詩篇相印證，因此在時間上較易定位。比如感懷類中的「病態如衰弱〔柳？〕厭厭向五年」，及「衰顏一病難牽復，曉殿君臨頗自羞」(殘句 4、5)，可能是後主在大周后病歿、他大病一場後的

幾年內所作的。又如「鬢從今日添新白，菊是去年依舊黃」(殘句 7)，從用辭上和心情上來看，頗近於上述〈九月九日偶書〉，作成的時間也可能在 968 到 975 之間。再如詠物類中的「揖讓月在手，動搖風滿懷」(殘句 3)，據宋人所說是後主在亡國入汴後，奉太祖之命，在宴席上誦念的。太祖並因此而譏刺他：「好一個翰林學士！」<sup>⑯</sup> 另外，感懷類中的「萬古到頭歸一死，醉鄉葬地有高原」(殘句 8)，據傳是他在卒前一年的歲暮，於醉後寫在窗牖上，醒後一見大驚；次年七月他便逝世了。<sup>⑰</sup> 除此之外，其他殘句的成詩時間便很難確定。

雖然如此，但是這些殘句卻顯現了後主詩風的重要特色：一、後主長於各類詩體，包括五古、五律、和七律。二、後主詩風淵源綜括漢、魏樂府和唐代律詩。三、他經過融合與轉化上述資源而形成自己獨特的詩風。首先，就各類詩體方面而言，上述殘句的句型與結構已然清楚，在此不必多言。其次，在詩風淵源方面，後主學自漢、魏五言古詩最明顯的例子是他的「迢迢牽牛星，皎在河之陽；粲粲黃姑女，耿耿遙相望」，便是源自〈古詩十九首〉中的「迢迢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……」；而他的「人生不滿百，剛作千年畫」，更明顯地是蛻變自「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」。至於他學自唐詩五律和七律方面，最顯著的例子，是他的寫景類殘句，比如：「烏照始潛輝，龍燭便爭秉」；又如傷懷類的「冷笑秦皇經遠略，靜憐姬滿苦時巡」。這些特別講究鍊句和對仗功夫的詩句，正是唐代律詩的特色。

總之，後主既精於律詩的鍊句與對仗，又長於古樂府詩中自然流暢的韻律感，將二者融合，變成他個人特別的詩風。從以上十七首全詩及十六段殘句看來，後主的詩用字典雅，韻律流暢，情泛乎辭。又由於他的際遇坎坷，因此詩中多顯哀愁。蘇軾對此深能體會，因此說：「李主好書神仙隱遜之詞，豈非遭罹多故，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？！」<sup>⑱</sup> 可說點破了後主心中那份沉重的無奈，以及百澆不解的塊壘。然而後主在作品中所顯現最重要的特色便

<sup>⑯</sup> 葉夢得，〈石林燕語〉，四庫全書，冊 863，頁 572。

<sup>⑰</sup> 見夏承焘，〈南唐二主年譜〉，頁 86。

<sup>⑱</sup> 蘇軾，〈東坡題跋〉，收於中國書畫全書編委會，《中國書畫全書》(上海：書畫出版社，1993)，冊 1，卷 2，頁 608。

是他那份自然流露的感情。這種特色在他的詞中發揮得更為淋漓盡致。

### C. 後主的詞

後主的詞膾炙人口，感人肺腑，千載以來，唱誦不絕。學者對它的研究論述，既多且精。個人學淺，所知有限，為免繁冗重複，謹將近年來有關後主詞的版本、譯本、和辨偽等研究資料編列簡介，附錄於後（見附錄），而在此則僅擬以管見試窺後主詞風之一斑。

依學者研究，傳世的後主詞可靠的共約四十首左右。<sup>⑧9</sup> 這四十首左右的詞，在時間上和內容上概括了後主一生（937-978）的歡樂與哀愁。學者對它們的研究多採取分期的方式。一般最常見的是將這些作品，依時間而分為早、中、晚三期。<sup>⑨0</sup> 每期的作品在內容上和用字遣詞上，都表現出明顯的特色。

早期，包括後主出生到大周后去世為止的二十八年（937-964）之間的作品，內容多寫他與大周后的琴瑟合鳴，與小周后的幽會偷情，以及歌舞昇平的後宮生活。他在幸福歡愉當中遠離人間的愁苦。此期詞中充滿描寫音樂、顏色、香味、舞蹈、情思、和綺夢的字眼，整體洋溢著艷情歡愛的氣氛，代表作品如：

#### 〈玉樓春〉

晚妝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嬪娥魚貫列；  
笙簫吹斷水雲間，重按霓裳歌遍徹。  
臨春誰更飄香屑？醉拍闌干情味切。  
歸時休照燭花紅，待放馬蹄清夜月。<sup>⑨1</sup>

<sup>⑧9</sup> 詳見附錄。

<sup>⑨0</sup> 參見陸衍蘆，〈詞人李後主〉，收於龍沐勛等，《李後主和他的詞》，頁12-20；陸嶺生，〈李後主和他的詞〉，同前書，頁22-34；季灝，〈李後主著作考〉（1947，三重：中央印製廠，1961再版）。

<sup>⑨1</sup> 見唐圭璋，〈南唐二主詞彙箋〉（1937初版；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63再版，1966三版），頁18b-19a。

#### 〈一斛珠〉

晚妝初過，沈檀輕注些兒個，  
向人微露丁香顆；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。  
羅袖浥殘殷色可，懷深旋被香醪涴，  
繡牀斜凭嬌無那，爛嚼紅葦笑向檀郎唾。<sup>⑨2</sup>

以上二詞似為大周后而作。大周后美艷，又擅長歌舞與音律，曾重譜〈霓裳羽衣曲〉。

#### 〈浣溪沙〉

紅日已高三丈透，金爐次第添香獸，  
紅錦地衣隨步散。佳人舞點金釵溜，  
酒惡時拈花蕊鶯，別殿遙聞簫鼓奏。<sup>⑨3</sup>

此詞描寫後宮熱鬧的歌舞場面，可見他此時生活的歡欣。

以上三首詞中的字句，多用「紅」、「金」、「香」、「花」、「舞」、「曲」、「簫」、「歌」等溫暖熱鬧而偏向於感官知覺的字眼，充滿歡娛的氣氛，顯見他此時正沈醉在軟玉溫香的幸福之中。<sup>⑨4</sup>

中期，涵蓋了大周后去世到南唐亡國為止的十一年（965-975）之間的作品，其中流露出空虛、抑悶、離別、感傷的心情。早期的熱鬧喧嘩，充滿色、香、味的歡樂氣氛，在此一掃而空。代之而起的是他在感受到人生的無常、世事的幻化、現實的壓力、和局勢的無可如何之後的空虛、寂寞、寒冷、與無力的感覺。此期的代表作品如：

#### 〈搗練子〉

深院靜、小庭空、斷續寒砧斷續風。

<sup>⑨2</sup> 同上註，頁6b~7a。

<sup>⑨3</sup> 同上註，頁13b~14a。

<sup>⑨4</sup> 關於後主早期的詞，用辭之擅於訴諸感官享受及音樂節奏的看法，又參見葉嘉瑩，〈迦陵論詞叢稿〉（台北：明文書局，1982），〈李煜〉部份，頁149-153。

無奈夜長人不寐，數聲和月到簾櫳。<sup>⑨</sup>

此詞描寫他夜長不寐、空虛、寂寞、孤寒的情景，用詞多採用冷調的「靜」、「空」、「寒」等字眼。

### 〈喜遷鶯〉

曉月墜，宿雲微，無語枕憑欹。  
夢回芳草思依依，天遠雁聲稀。  
曉鶯散，餘花亂，寂寞畫堂深院。  
片紅休掃儘從伊，留待舞人歸。<sup>⑩</sup>

此詞描寫他長夜未眠，愁思無奈的心情，所用字句如「墜」、「微」、「稀」、「散」、「亂」、「寂寞」、「休」、「歸」等等表現負面的、無可如何的心緒。

### 〈臨江仙〉

櫻桃落盡春歸去，蝶翻金粉雙飛。  
子規啼月小樓西，畫簾珠箔，惆悵卷金泥。  
門巷寂寥人去後，望殘烟，草低迷。<sup>⑪</sup>

宋人認為此詞是後主作於金陵被圍的那年（975）。<sup>⑫</sup>全詞充滿無力感，用字如「惆悵」、「寂寥」、「殘烟」、「低迷」等，顯現他心情之低沈。

晚期，包含了他亡國入汴，淪為囚虜，一直到逝世為止的三年（976-978）。此期作品多寫他懷念故國的憂思和悲懷：由暗噎哽咽、在夢中追尋故國、情緒低迴婉轉，到愁思轉劇、悲恨難忍、而直舒胸臆、感情奔放，無一不動人心絃。此期詞中用字多見：「醉」、「夢」、「淚」、「愁」、「空」、「殘」、「恨」、「悲」、「哀」等等悲愴的字眼。代表作品如：

<sup>⑨</sup> 見唐圭璋，前引書，頁12b-13a。

<sup>⑩</sup> 同上註，頁10b。

<sup>⑪</sup> 同上註，頁7b-9a。

<sup>⑫</sup> 見夏承焘的考證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138-9。

### 〈浪淘沙〉

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，羅衾不耐五更寒。  
夢裡不知身是客，一餉貪歡。獨自莫凭闌。  
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。  
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<sup>⑬</sup>

### 〈子夜歌〉

人生愁恨何能免，銷魂獨我情何限。  
故國夢重歸，覺來雙淚垂。  
高樓誰與上？長記秋晴望。  
往事已成空，還如一夢中。<sup>⑭</sup>

### 〈虞美人〉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？往事知多少？  
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  
雕欄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  
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<sup>⑮</sup>

### 〈烏夜啼〉

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忽忽。  
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  
胭脂淚，相流醉，幾時重？  
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。<sup>⑯</sup>

以上四首都是他此期最膾炙人口的佳作，感情奔放，直出胸臆；用字遣

<sup>⑬</sup> 見唐圭璋，同上註，頁22a-23a。

<sup>⑭</sup> 同上註，頁7a~b。唐圭璋也根據傳說，認為是因為這首詞，引起宋太宗的忌惡，因而酖殺後主。

<sup>⑮</sup> 見唐圭璋，同上註，頁4a-6a。

<sup>⑯</sup> 同上註，頁11a-b。

詞已不見雕琢，而多洗鍊、悲冷的字眼，如「寒」、「難」、「愁」、「情」、「淚」、「恨」等，流露出他心中一片宣洩難盡的悲情。

依個人管見，集以上各期的常用字彙，正足以顯示出後主每期詞風的藝術特質：早期是「聲、色、香、舞、情」；中期是「空、寒、殘、夢、迷」；而晚期則是「醉、恨、淚、愁、空」。

後主抒情的方式直接奔放，喜樂悲愁直出胸臆，毫不作態，因此動人。他的用語樸素自然，少用典故，不事雕琢，寫實傳真，直入人心。後主詞在表現技法上曾受到中主的影響。關於這點，學者多有深論，本文不擬在此贅述。<sup>⑩</sup> 然而，這些看似渾然天成、節奏自然的篇章，實是奠基於後主深厚的文字修養，以及豐富的音樂經驗之上的。這是後主的特殊秉賦，也是後來詞人無法超越他的地方。至於他如何在兩極化的人生變局與極度的情感掙扎當中，嘔心瀝血、以寸管抒情，這更非常人所能想像和企及的。

然而，歷代學者和詞人之中，仍有對後主詞持有特別看法的，比如北宋的蘇軾、明代的陳廷焯、和清代的李漁等人。遠觀的蘇軾在理性上雖然可以了解後主因「遭罹世故」，因而詩中多「神仙隱避之詞」；<sup>⑪</sup> 但是，在感性上卻不能同情後主纏綿的感情，特別對後主〈破陣子〉詞中「最是倉皇辭廟日，教坊猶奏別離歌，揮淚對宮娥」的情景，提出了強烈的批評。他認為後主那時應當慟哭於九廟之外，以贖亡國之罪，豈可揮淚對宮娥？！蘇曰：

「三十餘年家國，數千里地山河，  
幾曾識干戈？一旦歸爲臣虜，  
沈腰潘鬢消磨。最是倉皇辭廟日，  
教坊猶奏別離歌，揮淚對宮娥。」  
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責，舉國與人，

<sup>⑩</sup> 參見附錄所列陸衍廬、陸嶺生，郭德浩，蔣勵材，季灝，及謝世涯等人的論著；特別詳見陸嶺生，前引文，頁39-59；又見謝世涯，《南唐李后主詞研究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1994），頁6-12；73~157。

<sup>⑪</sup> 同註<sup>⑩</sup>，並參見前面論後主詩的部分。

故[固]當慟哭於九廟之外，謝其民而後行，  
顧乃揮淚宮娥，聽教坊曲！<sup>⑫</sup>

蘇軾的評語反映了他身爲北宋士大夫，以社稷爲重的價值觀。明代陳廷焯在《白雨齋詞話》中，則認爲後主詞太過爽利，不及溫庭筠蘊藉。至於清代的李漁，則更譏刺後主詞之哀悽爲「倡婦倚門語」。<sup>⑬</sup> 這兩人尖刻冷酷的批評顯見他們不同的文學審美觀：由於他們對後主的遭遇毫不同情，因此也不能接受他那種「情泛乎辭」近於豪放的表達方式，反而肯定溫庭筠式的含蓄蘊藉、講究鍊句與修辭的婉約風格。<sup>⑭</sup>

與上述這些論點持相反意見的是近代學者，如王國維、鄭騫、葉嘉瑩、和謝世涯等人。他們對後主的詞推崇備至，並且肯定他在中國詞史上的地位。王國維指出後主詞在感情上的深刻與境界上的高超，幾乎無人能出其右：

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……

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，故生於深宮之中，  
長於婦人之手，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，亦爲詞人所長處。

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，閱世愈深，則材料愈豐富，  
愈變化，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之作者是也。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，閱世  
愈淺，則性情愈真，李後主是也。

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。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。宋道君皇帝〈燕  
山亭〉詞略似之。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，後主則儼有釋迦、基督擔荷人  
類罪惡之意，其大小固不同矣。<sup>⑮</sup>

<sup>⑫</sup> 見蘇軾，《東坡志林》，四庫全書，冊863，卷7，頁640。四庫標題誤作「跋陳後主詞」；又，夏承焘誤以爲蘇軾評語出自《東坡志林》卷4；同時，夏承焘並引《甕牖閒評》，以爲該詞非後主所作，見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，頁80。

<sup>⑬</sup> 詳見謝世涯，前引書，頁58-173。

<sup>⑭</sup> 詞有兩種不同風格：婉約與豪放，各以溫庭筠和韋莊爲代表。詳見鄭騫，《從詩到曲》（台北：科學出版社，1966），頁103-109：〈溫庭筠、韋莊、與詞的創始〉一篇；又見葉嘉瑩，〈從人間詞話看溫韋馮李四家詞的風格〉（台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88）。

<sup>⑮</sup> 以上四則論後主詞，皆見王國維，《人間詞話》，收於《王觀堂先生全集》（台北：文華出

葉嘉瑩也十分肯定後主在詞發展史上的地位。她認為後主詞在內容方面，由於一己真純的感受而直探人心，因而形成深廣的意境。又由於他所使用的文字明朗開闊，而造成博大的氣象。至於後主在詞方面的成就，純屬個人的天賦異稟，是一種天才型的創作，並不代表詞史演進中的一個階段。<sup>⑩</sup> 換句話說，後主的詞是超越了他的時代，就詞的發展史來看，是一個異數。

鄭騫則從詞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為後主定位。他認為後主詞與唐末豪放派的開創者韋莊的詞相較之下，更高一籌：

韋詞畢竟是詞史初期的作品，堂廡氣象還差得多。眼界之大、感慨之深，當然不能不讓後賢。韋莊的〈菩薩蠻〉五首，與李後主的〈浪淘沙〉、〈虞美人〉諸詞，都是感慨之作。韋詞那像李後主那樣寓沈著於豪放，寄俊逸於悲涼呢？<sup>⑪</sup>

其次，他指出詞在內容上和形式上的發展：「唐、五代詞多小令。長調為宋初之事……蘇軾與柳永為長調大家……」。他又說：「蘇詞一出，才把詞的領域擴大，地位提高。詞到此時才完全脫離了小道末技，進而與詩、文佔有同樣的地位。」<sup>⑫</sup>

謝世涯則更進一步、確切地肯定：後主詞實為蘇軾等北宋詞的濫觴。他並具體地標示出後主詞對歐陽修、蘇軾、秦觀、和辛棄疾等人直接影響的例證。<sup>⑬</sup>

雖然鄭騫與謝世涯的看法稍異於葉嘉瑩，但是，基本上，他們都承認後主詞在本質上已超越了詞在當時的發展。這也就是王國維所說的：「詞至李

版社，1968），冊13，頁5930-5931。又關於他將後主詞比釋迦及基督之說法，陸衍蘆已指其不甚恰當，參見陳葆真，〈藝術帝王李後主(一)〉，《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》，3期，1997年，頁45；又謝世涯也有辯解，見前引書，頁202-222。

<sup>⑩</sup> 見葉嘉瑩，〈迦陵論詞叢稿〉，頁117-118。

<sup>⑪</sup> 見鄭騫，〈從詩到曲〉，頁109。

<sup>⑫</sup> 以上兩段引文分別摘自鄭騫，前引書，頁118，123。

<sup>⑬</sup> 見謝世涯，〈后主在詞史上之地位〉，前引書，頁12-18。

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」。這種看法應是所有學者都一致同意的。後主在詞史上居於至尊的地位也為舉世所公認。

然而，後主的藝術才華還不止於此。文、賦、詩、詞之外，他還能書、擅畫，精於歌、舞、棋奕、鑑賞，並富於書籍、法書、名畫等收藏。徐鉉讚美他「天縱多能，必造精絕」，一點也不誇張。他確屬天賦異稟、才學兼備，實為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的全方位藝術家。關於這點，作者將之別立一章，名曰：〈後主的藝術活動〉，可望於下期登載。

## 附錄：李後主詞研究資料

## 一、版本

後主詞最早結集刊行於何時，已難確知，在北宋學者歐陽修、王洙、與王堯臣等人所編的《崇文書目》(1041)中並未專刊他的詞集，而只列出《李煜集》及《李煜集略》各十卷。<sup>⑪</sup>這兩種集子是否包括了他的詞，已不可知。依饒宗頤《詞集考》，後主詞於「北宋陳世脩有輯鈔本……」<sup>⑫</sup>又據詹安泰的研究，後主詞的輯印，最早見於南宋，當時的版本有兩種形式：一為單行本，始見於尤袤的《遂初堂書目》(編於 1167 年左右)中的「樂曲類」，列有《李後主詞》；另一為與中主詞合刊的合集本，見於南宋末年、陳振孫的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中所載的《南唐二主詞》共一卷。<sup>⑬</sup>可惜這些南宋刊本今已失傳。

至今流傳下來最早的後主詞集是明代的兩個版本：一為譚爾進校訂的墨華齋刻印本(呂遠刻於萬曆庚申，1620)；一為毛晉的汲古閣舊抄本。至於清代重刻比較重要的則有四種刻本，分別為：

1. 文燦刻本(亦園藏本《十名家詞集》，康熙時期，1662-1722 刻)
2. 金武祥刻本(粟香室叢書，光緒時期，1875-1908 刻)
3. 劉繼增，《南唐二主詞箋》(光緒時期，排印本)
4. 王國維校補本(沈宗崎刻《晨風閣叢書》，宣統時期，1909-1911 刻)

此外，還有朱景行錄自明代《永樂大典》的抄本，和吳訥本，以及蕭江聲本。<sup>⑭</sup>至於清末民初校勘後主詞，比較重要的學者有劉繼增、王國維、

<sup>⑪</sup> 見註<sup>⑩</sup>及參見前面討論後主的文與賦部份。

<sup>⑫</sup> 饒宗頤，《詞集考》，唐五代宋金元編，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)，頁28-32。這項資料蒙王國璽教授賜告，謹此致謝。

<sup>⑬</sup> 參見詹安泰，《李璟、李煜詞》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58)，頁48-51。

<sup>⑭</sup> 這些版本的淵源及相互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，非作者所長，詳情請參見詹安泰編注，《李璟、李煜詞》，頁48-51；謝世涯，《南唐李后主詞研究》，第四章有關李煜詞版本及真偽的考證部份，頁56-72。

和劉毓盤等人。<sup>⑮</sup>

## 二、近人研究

二十世紀以來，研究後主詞的中文和外文論著很多，可以分為：專書、年譜、和論文等三大類。

## A. 專書

先就專書類而言，據作者所見，比較重要的專書，在中文方面，有以下的十二種(依出版時間順序)：

1. 王國維校補，《南唐二主詞》(收在《晨風閣叢書》，卷 16，及《唐、五代二十一家詞輯》，1928。後收入《王觀堂先生全集》(台北：文華出版公司，1968，冊 15，頁 6737-6756)
2. 唐圭璋，《南唐二主詞彙箋》(1937 初版，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63 再版，1966 三版)
3. 季瀨，《李後主著作考》(1947，三重：中央印製廠，1961 再版)
4. 王仲聞，《南唐二主詞校訂》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57)
5. 詹安泰，《李璟、李煜詞》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58)
6. 蔣勵材，《李後主詞傳》(台北：中華叢書編委會，1962)
7. 王次聰，《南唐二主詞校注》(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65)
8. 龍沐勳等，《李後主和他的詞》(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71)
9. 高蘭、孟祥魯，《李後主評傳》(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5)<sup>⑯</sup>
10. 付正谷、王沛霖，《南唐二主詞折釋》(天津：古籍出版社，1988)
11. 田居儉，《李后主新傳》(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1)
12. 謝世涯，《南唐李后主詞研究》(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1994)

## B. 年譜

在年譜方面，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四種(依時間順序)：

<sup>⑮</sup> 見唐圭璋編注，《南唐二主詞彙箋》，頁2。

<sup>⑯</sup> 此項書目資料蒙王國璽教授賜告，謹此致謝。

1. 郭德浩，〈李後主評傳〉，原載於《文學年報》，1932 年，後收於龍沐勛等，《李後主和他的詞》(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71)，上冊，頁 63-163。
2. 夏承焘，〈南唐二主年譜〉(1935 成書，1955 重改；台北：文海出版社影印，1974)；又收於龍沐勛等，《李後主和他的詞》，下冊，頁 21~167。
3. 章崇義，〈李後主詩詞年譜〉(香港：龍門書局，1969)
4. 詹幼聲，〈南唐二主詞研究〉(武漢：武漢出版社，1992) ⑪

### C.論文

關於論文類方面，則為數更多，不勝枚舉：從 1924 到 1978 年之間，至少已有專論 42 篇。⑫ 大抵而言，這些文章依研究的角度來看，可以分為兩大類：一為學術類，一為政治類。據作者所過目，在純學術方面，比較重要的論文有以下的四篇：

1. 陸嶺生，〈李後主和他的詞〉
2. 郭德浩，〈李後主評傳〉
3. 陸衍廬(侃如)，〈詞人李後主〉 ⑬
4. 葉嘉瑩，〈李煜〉 ⑭

以上四篇文章都將後主的詞配合他的生平事述，予以分期，並解析後主詞的藝術成就。他們對後主個人的際遇多表同情，對他的詞則推崇備至。

反觀另外採取政治角度去看後主詞的文章，則以 1955 到 1956 兩年間，在中國大陸《光明日報》的〈文學遺產〉專欄上登載的十七篇文章為代表。這些文章都以社會主義「人民性」的觀點去批判後主的詞，對後主人和他

⑪ 此為王國樸教授賜告。由於作者未曾讀過該書，在此不敢妄評。

⑫ 參見《中國歷代皇帝文獻目錄》(東京：國書刊行會，1979)，頁 79-82。

⑬ 以上這三篇文章都收在龍沐勛等，《李後主和他的詞》，冊上，頁 13-62；63-163；冊下，頁 1-20。

⑭ 收於葉嘉瑩，〈迦陵論詞叢稿〉，頁 94-153；又收入她的《從人間詞話看溫韋馮李四家詞的風格》，頁 94-118。

的詞風多給予負面的批判。⑮ 關於這種特殊的觀點，李澤厚在 1956 年當時已撰〈談李煜詞討論中的幾個問題〉，指出那類批評角度的缺失。⑯

此外，在外語方面，又有學者以日、英、德諸種語文對後主詞作翻譯與研究。⑰ 據作者所知，在日文方面比較重要的有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編校的《中國詩人選集》(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57-61)，第十六冊，《李煜》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(Columbia University)的 Burton Watson 教授便根據此日譯本，將後主詞譯成英文。在英文方面還有四種譯本，分別是：

Liu Yih-ling & Shahid Subrawardy (tr.), *Poems of Lee Hou-chu* (Bombay: Orient Longman, 1948).

Malcolm Koh Ho Ping & Chandran Nair (tr.), *The Poems and Lyrics of Last Lord Lee* (Singapore: Woodrose, 1975).

Daniel Bryant, *Lyric Poets of the Southern T'ang: Feng Yen-ssu (903-960) and Li Yu (937-978)* (Vancouver: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, 1982).

Daniel Bryant, "Messages of Uncertain Origin: 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the Nan-T'ang erh-chu tz'u," in Pauline Yu (ed.), *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* (Los Angeles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94), pp. 298-348. ⑲

這些譯本因個人未曾研讀，因此不予置評。

### 三.真偽問題

後主的詞雖經歷代有心人士的輯印刊行，但是，千年以來每有流失。元代白樸在他的《天籟集》中，有〈水調歌頭〉一闕，為感嘆南唐故宮而集後主詞句所作，其中有許多詞句已不見載於明、清以來傳世的後主詞集之中。

⑮ 《光明日報》上的十七篇文章後來結集成書，見文學遺產編輯部，《李煜詞討論集》(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鉛印本，1957)。

⑯ 李澤厚此文原作於 1956 年，登在他的《門外集》，後收入他的《美學論集》(板橋：駱駝出版社，1987)，頁 472-489。

⑰ 從 1941-65 年間的外文專著書目，參見謝世涯，《南唐李后主詞研究》，頁 52-54。

⑱ 以上兩項資料蒙王國樸教授賜告，謹此致謝。

可見後主詞在元代以後又有佚失。<sup>⑫</sup> 現今傳世的後主詞有多少首？詳細數目難以確定。據個人所知，至少有兩種說法：一為三十多首；<sup>⑬</sup> 一為四十多首。<sup>⑭</sup> 又、據唐圭璋仔細的考證，認為確實可靠的有三十四首，全部列入他的《南唐二主詞彙箋》中。唐圭璋又在書後附上王國維所輯補的十首，但他卻認為其中的五首可能是五代別的詞人所作：

1. 「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鉤，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……」〈相見歡〉。此首有人以為是後蜀孟昶所作。<sup>⑮</sup>
2. 「柳絲長，春雨細，花外漏聲迢遞……」〈更漏子〉。此首有人以為唐末溫庭筠所作。<sup>⑯</sup>
3. 「轉燭飄蓬一夢歸，欲尋陳跡悵人非，天教心願與身違……」〈浣溪沙〉。此首有的學者以為是南唐馮延巳所作。<sup>⑰</sup>
4. 「遙夜亭皋閒倒步，乍過清明，早覺傷春暮……」〈蝶戀花〉。有的學者以此為李冠或歐陽修所作。<sup>⑱</sup>
5. 「浪花有意千重雪，桃李無言一隊春……」  
「一棹春風一葉舟，一綸繆縷一輕鉤……」這兩首〈漁父詞〉據北宋的郭若虛認為是後主題在南唐畫家衛賢的《春江釣叟》圖上的作品，但唐圭璋卻懷疑它並非後主所作。<sup>⑲</sup>

<sup>⑫</sup> 此據唐圭璋，《南唐二主詞彙箋》，頁28a。

<sup>⑬</sup> 見陸嶺生，〈李後主和他的詞〉，頁13-62，特別是頁22。又見謝世涯，〈南唐李後主詞研究〉，第四章：〈后主詞辨偽〉，頁56-72，列出二十三首辨偽。

<sup>⑭</sup> 見陸衍廬，〈詞人李後主〉，頁1-20，特別是頁11。

<sup>⑮</sup> 唐圭璋，《南唐二主詞彙箋》，頁24a-b。

<sup>⑯</sup> 同上註，頁24b-25a。

<sup>⑰</sup> 同上註，頁27a。

<sup>⑱</sup> 同上註，頁11a。

<sup>⑲</sup> 見郭若虛，〈圖畫見聞誌〉(1074)，畫史叢書(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4)，冊1，卷2，頁176-7；唐圭璋，同上註，頁27a~b。但唐圭璋並未說出原因何在。

除此之外，王國維所輯補的其中一首〈楊柳枝〉：「風情漸老見春羞，……到處芳魂感舊遊……」應為七言詩，已收在《全唐詩》中，題為〈賜宮人慶奴〉。<sup>⑳</sup> 總而言之，依據唐圭璋所彙集的三十四首，加上他認為王國維所輯補的可靠的五首，總計後主詞存世可靠的至少應有三十九首，簡言之，大約四十首左右。

<sup>⑳</sup> 見前面論後主詠物詩部份。



圖 1 南唐 樂闔寺舍利塔 江蘇 南京 採自《中國美術全集·建築藝術篇》，冊 4，頁 36